

# 越是反经验的结论,越需专业谨慎与耐心

曹 林

北京连续数天出现雾霾,对雾霾的“归因”成了这几天的舆论主题。归因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官方及专家手中,不过这些归因都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质疑,甚至成为笑话。比如,有专家说“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年的国庆节期间都是北京空气质量最不好的时期”,就受到了质疑。北京外办主任赵会民“中国人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也不小”的言论,更成公众吐槽的焦点。北京环保局随后回应称“相比机动车、燃煤和工业扬尘,烹饪油烟并不算主要的PM2.5来源,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随后,环保部环评特聘专家库成员彭应登对雾霾的解释,再一次激起了争议。这位专家称:跟民众感观不一的是,近年

北京的灰霾天实际上呈下降趋势,目前自动监测站在高温条件下获得的PM2.5监测数据会失真,需尽快纠偏——公众明明感觉雾霾天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专家却称实际呈下降趋势;雾霾高发频频“爆表”,不去治理空气,反去怪仪表?

看这些引起炮轰的官方和专家言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与公众的经验与感觉相悖,甚至是对立的。公众明明感觉以前国庆节期间都是秋高气爽,而今年雾霾连连,专家却说“历史数据看每年国庆节期间空气都差”;公众的经验明明是,汽车尾气和燃煤才是雾霾祸首,而官方却能把板子打到老百姓自古以来的做饭方式上;公众的总体共识是近年来雾霾天比过去多多了,专家却说“十年来不断呈下降趋势”。一个反感觉反经验的结论抛出

来,怎么不被质疑和批评?当然,并不是公众的经验和感觉都是对的,感觉很多时候并不靠谱,有很多错觉和谬误。所以,需要尊重专业和科学,让经验和感觉臣服于科学的判断。官方和专家在解释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不需要迎合多数人的感觉,而需要尊重科学与事实,但是,当一个科学结论或事实明显与多数人的感觉相悖时,就不能只是粗暴地给一个结论,而需要用专业的谨慎和耐心,去给公众以细致的解释。越是反经验的结论,就越需要专业的谨慎和耐心,才能说服公众接受。

比如说“中国人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这个问题,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有,那些露天的烧烤,餐馆乱排放的油烟,都是污染源。中国人习惯的烹饪,也确实产生更多的油烟。但是,

烹饪油烟对PM2.5的具体贡献有多少,目前并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就非常严谨。其一,要用科学数据说话,而不是专家自己凭感觉信口开河;其二,要有明确的限定,这个“做饭”并不是普通人理解的那种做饭,而是特殊天气时以特殊的方式做饭,否则很容易让家庭主妇们产生抵触;其三,表述要准确和严谨,不能把微不足道的原因放大成主要原因,比如环保界的表述比较科学,说“相比机动车、燃煤和工业扬尘,烹饪油烟并不算主要的PM2.5来源”,这就不会让人误解。

官方新闻发言人,不仅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说的是什么,应该说些什么和怎么说,更应该知道说了后会有怎样的舆论反应。他们应该预料到公众对“中国人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也不小”的反应,从而

有针对性的解释。同样,“近十年北京的灰霾天实际上呈下降趋势”也是如此,公众感觉雾霾天越来越多,而实际呈下降,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不能傲慢地对公众感觉视而不见,要拿出第三方的统计数据,要有历史数据的对比,还要在“为什么雾霾越来越少而公众感觉越来越强烈”上作一些解释。还是那句话,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只有缺乏说服力的证据。多数人的感觉不一定是对的,但一定要以“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证据”告诉公众:你们的“感觉错了”一个与公众感觉相悖的空洞结论,只会激起公众的对抗心态。

公众看待社会问题需要客观和理性,不能跟着感觉和情绪走,但是,有谨慎和耐心的官方,才有客观和理性的民众。

## 冰点时评

### 行贿该当何罪

傅达林

反腐是当前最受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一批要职高官纷纷落马,人们在见证国家反腐魄力的同时,也对腐败犯罪中的行贿者免刑现象产生异议。近日,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因涉嫌行贿罪等被检方公诉,再度引出了行贿者如何治罪的话题。《中国青年报》在盘点近一个月曝光的官员受贿案发现,一个共性细节是作为“配角”的行贿者群体庞大,其最终去向如何却往往不为人知。有专家更是称行贿者被司法追究比例仅为受贿者的1%。

虽然在刑法规定的意义上行贿并不必然治罪,但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按照这一标准,现实中还有大量行贿人逍遥法外。惩治这种偏差是反腐法治化的需要,而其实现也只能寻求司法法治化治理方案。

不可否认,行贿犯罪之所以大面积压治罪范围,既与司法系统的宽宥有关,也与治罪的标准不明确有关。前者比如,司法机关在认定行贿犯罪时,往往会受到贿赂潜规则的影响而对行贿人产生同情;同时立法基于激发行贿人告发受贿人的旨趣,又对行贿犯罪减轻或免除刑罚作出了规定,客观上使得司法实践容易滥用立法的宽宥,以致鲜见行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正常状态。后者比如,在构成行贿的具体情形的判断上,因为立法对“不正当利益”等模糊化规定而产生操作性不强的弊病;而在惩治行贿的范围上,又因为立法具体将行贿限定在“财物”上而出现涵盖性不足的缺陷。

可见,要对行贿罪展开精确化打击,首先必须准确厘定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的界限,确切区别主动行贿与索贿后行贿情形,适度扩大行贿犯罪的内容范围,进一步确立起科学完备的治罪标准。但是仅此还不够,它忽略了一个长期以来我们对行贿罪治理的长期大误区:对行贿危害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受贿危害的视角,而缺乏治罪的自主性逻辑。

对行贿罪的有效治理,必须在司法上弄明白一个预设前提:打击行贿犯罪究竟是基于惩治受贿犯罪的功利性考虑,还是基于行贿犯罪本身的刑事违法性?或者说:我以为,中国司法对行贿犯罪的惩治不力,很大程度上与前一种认知有关。

在众多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正当性辩护中,都是将行贿作为受贿的诱导因素予以强调的,因为先有行贿才有受贿,所以司法打击需要找到源头。这并未击中犯罪治理的要害。行贿犯罪需要打击,不在于其诱惑了公权力走向堕落——官员堕落只能由其自身承担责任,且行贿的源头还可以继续推理至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变质,这才是最终源头性的诱惑;打击行贿犯罪的正当性更在于:对行贿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违背了利益获取的正当性、合法性原则,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经济管理秩序,损害了其他社会主体公平获利的机会。正是行贿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才构成了对其进行司法法治化治理的前提。

所谓司法的法治化治理,就是基于上述前提,将行贿犯罪纳入司法的常态化追诉当中,严格恪守法治原则,依据法律标准进行“有罪必究”的惩治。这一方案反对的是将行贿入罪作为打击和预防官员腐败的政策性工具,依据反腐严峻形势时轻时重或时紧时松的惩治,或是在法治手段之外寻求其他“旁门左道”。实践中,为了反腐形势的需要,一些地方对受贿犯罪的治理并不是出自法律理性,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寻求功利性方式,例如建立“行贿黑名单”,仍旧是一种行政化手段,并不能取代司法的法治化治理。

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效果,必须确立在法治化方案上。对此,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过: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遗憾的是,司法对很多领域违法犯罪的治理,都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要么滥用立法的宽宥打击不力,要么根据犯罪形势严重程度进行超长规严打,这些都不是司法法治化的治理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对于犯罪的治理需要排除外在影响,就罪论罪的进行法定化、普遍化、常规化处理,久而久之自然会发挥出司法对于社会秩序的持久性治理功能。



## 有恃无恐

富士康公司风波不断,最近,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被指强制安排千余名在校学生进入富士康实习,不参加者将不予发放学位证书。有学生透露,“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搬机器,撕纸贴纸”。(《东方早报》10月10日)

漫画:徐简

## 治理公车私用 必须 后果严重

郭文婧

据报道,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此外,在全国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南方都市报》10月10日)

公车私用在我国泛滥成灾、屡禁不止。在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的2013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活动上,面对令人触目的公车私用曝光画面,坐在问政台上的武汉市委秘书长龙正才就主动自我批评:“当前公车规模太大,导致公车私用都见怪不怪,包括本人在内都有公车私用情况。”如何解决这一痼疾,各地都出了招,但效果有限。

目前,中纪委的回复为治理公车指明了一个方向,如果对公车统一标识、GPS定位,无疑将有助于加大对公车私用的监督力度,也会给公车私用者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不过,我们有理由担心“条件成熟”这一前提,会成为某些地区和部门拖延的借口,因此,有必要列出明确的时间表,毕竟,对公车统一标识不是能不能为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

而在这个基础上,更应该加大违规使用公车的成本。人们是否违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违规的可能性与违规的风险成本。可以说,目前公车私用的违规风险成本太低,是导致公车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国外,据媒体报道,1995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

卡与妻子私自使用公务车外出旅行,最终被判6个月监禁;2009年7月,时任德国卫生部长的格拉·施密特公车私用不仅令她本人政治前途尽毁,连其在政党社民党的总理竞选人也深受牵连;2010年8月,韩国总理提名人金台镐因妻子曾公车私用,不得不辞去总理提名人;2010年12月,美国密歇根州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因把属于国会办公室的公务车借给儿子用,不得不向美国财政部赔偿5682美元。

如果不能真正确立“公车私自用,后果很严重”的制度体系,即使“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都落到了实处,公车私用的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国家发改委的文件要走多久

殷国安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通知,决定自本月起,降低本市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未按要求降费,市发改委称,这并非北京市的价格政策问题,而是下面执行不力,任何一个部门不按这一规定执行最新收费,市民都可以举报,报一个查一个。(《北京青年报》10月10日)

此次通知降低的收费标准主要涉及公安、司法、交通、农业、工商等多个部门。据此,因丢失要求补办因私护照的收费标准,由现行的每本400元降为每本200元。但记者走访了位于安定门东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咨询台服务人员表示,未过期护照丢失补办的收费标准目前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400元(另加20元加注费)。关于国家收费降低的说法,工作人员表示有所耳闻,但还没收到

降价的通知。如果以最坏的恶想来推测,可能是补发因私护照的收费标准降低了一半,会减少有关部门的收费数额,所以迟迟不落,多收一天是一天。而所谓“没收到降价的通知”或许只是一个借口?当然,北京出入境管理总队也可能确实没有收到有关文件,或者收到了还在办理之中,等待领导批示。

由此想到一个老问题,国家发改委的文件“旅行”到北京市公安局需要多少天?曾经有调查指出:一份由中央发出的一般性文件,传递到基层至少需70天。但这不应该适用于北京,因为北京任何一个部门距离各个中央部委,都在一天的行程之内。一份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落实,到底被谁耽误了?

第一,是被北京市发改委耽误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文件是今年8月2日发出的,而北京市发改委转发文件是2013年

9月29日。这里竟然花去了58天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要拖这么久。而且,北京方面已经违反了国家发改委文件规定:“各省(区、市)价格、财政部门要于9月底前,将降低后的收费标准通过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事实上,北京市发改委的文件发布时间已经到了10月9日。

第二,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也有责任。因为同为北京市的下属部门,位于水碾子东路的北京市正阳公证处,“十一以后遗产公证费用都已下调”。据业务员介绍,自10月1日起,公证处均接到通知,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的公证收费从之前接受受益额2%的固定比例,改为分梯度累计收取。可见,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办事效率确实有问题。市发改委说他们执行不力也是有道理的。

这份文件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旅行”2个多月而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原因并不清楚,估计与官僚主义作风有关。

## 我从美剧里看到了什么

国人的生活。比如,《Friends》里的六个主人公,一个是街角咖啡店的服务器,一个是小餐厅的厨师,一个是不入流的演员,一个是大学里的教师(古生物学,不像是能赚钱的专业),一个是公司里的职员,还有一个甚至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按摩女。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似乎都不高,但都活得开开心心。当然,在生活中他们也会遇到挫折和坎坷,也有内心的挣扎,会做错事,但每个人都凭自己的劳动吃饭,真诚面对生活和感情,坦坦荡荡。

再比如,《绝望的主妇》里的四个女主人公,都是小镇上的家庭主妇,地位并不显赫。小镇的生活平静,但也不时会出现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甚至会彻底颠覆原来的生活。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坦然面对,积极而乐观,勇敢地克服困难。我最喜欢的是每一集快要结束时,出现的一小段旁白,这些话紧贴剧

情,充满生活的哲理,告诉人们要有爱,有勇气,懂得宽容和诚实,失败远比欺骗更为可贵。看了这些反映普通美国人生活的电视剧,你能从中受到启迪,对生活有新的领悟。

然而,打开国内的电视剧频道,放眼望去,往往是黑压压一片跪倒之人,耳中听到的,全是“奴才”、“主子”的乱叫。我们特别喜欢在电视剧里展示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宫廷的政治斗争,后宫的尔虞我诈,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有时候看剧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步步惊心》。

以我无意间看到的《甄嬛传》里的一个情节为例:甄嬛为了陷害皇后,在怀孕期间假被皇后后推倒。当皇帝对此将信将疑时,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出现了,哭着对皇帝说,她亲眼看见皇后推倒了甄嬛。皇后因此被打入冷宫,甄嬛也由此上位。看到这一情节,我不禁怒火中烧:为什么

## 故宫博物院将变身考级院?

刘效仁

在台北参加“乾隆特展”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将开门办学,与北京东城区政府合作,建“故宫学院”。最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除内部各项培训,面向业界和社会教学。据透露,故宫出版社已申请到国家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书画类的资格,建立面向全国书画学习者的技能培训与测评体系,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也将像英语、弹钢琴一样设置不同的级别,有关考级的相关培训也有望在故宫学院举办。(《京华时报》10月10日)

“故宫博物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在,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今,(它)既是收藏明清皇室珍宝的巨大宝库,也是记载明清宫廷历史的鲜活档案……故宫博物院的生命线,就依附在紫禁城宫殿中,顺着它的文化脉络生长、延伸……”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描述自己。1925年10月10日,建立在明、清两代皇宫及收藏基础上的综合性博物馆的北京馆,堪称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今年“十一”再创单日客流17.5万的年度纪录,仅仅是一个表征。事实上,其一举一动都在高度关注中。

2011年5月始,故宫深陷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屏风门、拍卖门、封口门、古籍门、逃税门“十重门”,遭受广泛诟病,公共舆论给予集体性抨击。以至于让国人怀疑,故宫博物院是否胜任“它的文化

脉络生长、延伸”的神圣职守?并由此反思到该院的机制弊端。比如,在有编制的一千四百名故宫人里,大致是老职工、内部子弟和社会招聘大学生“三足鼎立”。如此不鼓励进取和创新的人事制度,就是最大的发展隐患(《人民日报》2011年8月17日)。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也使其每次应对舆论监督时的“自查自纠”成了“故宫独角戏”。“内无忧、外无患”的体制,同样是重塑公信的大敌。

在“十重门”的多事之秋,故宫新掌门人单霁翔曾踌躇满志,推行多项新政,意在力挽狂澜。此番“开门办学”,包括招揽考级业务,无疑是某种延续。然而,如此新政颇有些跑偏或者说不务正业的嫌疑。老实说,故宫博物院当下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时至今日,一套堪称完整的藏品名录,依然没有面世,甚至“故宫内的文物估计是清理多少年都清理不完的,编制藏品名录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故宫的当务之急,其实依旧是做好文物整理的基础性工作,并公开馆藏展出。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做好故宫文化产品研发和出版,使更多的国民将“故宫文化带回家”,以提升文化传播功能。显然,亟待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人事机制以及独立公正的外部监督作为智力支持,自然也任重道远。如此“重任”之下,却节外生枝,把全国书法和绘画技能测评考级攥在自己权力之下,力有所不逮不说,可怕的是作为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从此可能变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更何况,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级,该怎样考怎样评?

## 对自锯病腿的汉子 别止于同情

王石川

一把钢锯、一把小水果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保定硬汉郑艳良用这三样简单的工具,在家中床上将自己患怪病的右腿锯下,为忍住疼痛他咬掉了四颗槽牙。如今,同样的怪病还在他左腿上无情蔓延。郑艳良希望好心人支招,医治好时刻折磨自己的怪病,安上一副假肢,重新为妻女撑起一个家。(《燕赵晚报》10月10日)

自锯病腿的郑艳良,是悲情而无奈的农村硬汉。他得的怪病全国都很少见,只能保守治疗。郑艳良为看病,花光家中积蓄,无奈之下,只能回到家中。“被疼痛折磨的意识模糊,喊叫的周围邻居都不能入睡。不管黑夜白天都只能倚坐着,无法平躺下”,郑艳良便有了截肢的想法,但家中吃饭都成了问题,根本没钱去医院做手术。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忍受,郑艳良不会这样“自虐”。

郑艳良的遭遇也许只是极端案例,但是,需要追问,他为何没能享受到制度的救济?郑艳良是河北保定清苑县农民,不知道他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根据清苑县曾公布的数据,农民参加新农合后,在各级医疗机构住院补偿起付线及补偿比例:乡级医疗机构起付线100元,补偿比80%;县级医

疗机构起付线300元,补偿比70%;市级医疗机构起付线1000元,补偿比60%;省级医疗机构起付线1500元,补偿比55%;省外三级以上医疗机构起付线4000元,补偿比45%。由于报道语焉不详,无法获知郑艳良是否参加新农合,又是否获得相应的报销、补偿?

当然,即便有一定比例的补偿,对于余下的费用,郑艳良恐怕也承担不起。他的困境,让不少网友想到了日前的一则消息:俄罗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有网友随即吐槽,“郑艳良何不移民俄罗斯?”且不说俄罗斯的全民免费医疗是否货真价实,但一个公民不管生活在哪里,他都有权得到救助,因此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何破解郑艳良所处的困境?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

类似郑艳良的遭遇,屡见报端,其共同的特点是,患有怪病,无钱救治,要么苦熬要么自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媒体报道了,无论社会各界还是当地政府就会有所表示。问题是,如果媒体没报道呢?

郑艳良的愿望很卑微,他最揪心的是一家人如何生活下去,盼望能有热心人支招,帮他医治好患怪病,然后装上一副假肢。那样他就能自己照料自己,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养家糊口了。谁来帮他实现这个卑微的愿望,点亮这个破损家庭的微小希望?

会受到电视情节的影响。如果他们从小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如果用尽心机把别人干掉以后自己爬上去还不受惩罚,他们也可能学到这种生存之道。

我不明白的是,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展现,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上展现那些人性丑恶的一面?而且这样的丑恶不会受到惩罚。中国的一些电视连续剧恰恰告诉人们:心机最深、最心狠手辣、最冷酷无情的人往往是最成功的,能当很大的官,能挣很多的钱。

我无意主张电视剧只能歌功颂德,呈现伪善的道德说教。我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也许可以用不那么笨的方法,实现我们希望的教育目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并不比我们低,应当说这和美国人的教育方式有极大关系。好莱坞的大片最追求票房收入,但爱国主义往往是这些追求票房收入最大化的大片的主题。这一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可以启发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的影视作品,究竟带给观众什么?

今天,人们总是喜欢拿教育说事,认为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皆能从教育中找到源头。但教育仅仅是学校的事吗?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他们接收资讯的渠道日益多元。比如,孩子们都喜欢看电视,就